

南明抗清运动中明遗民的失落

李瑶瑄

(四川大学 俗文化研究所,成都 610064)

摘要 明遗民以救亡为己任,投身复明运动本为其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。但是,明王朝在它腐朽衰败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凝聚力,南明各朝廷实为名利争夺之地。无论是自负有能力经营政局的张岱,还是对君臣伦理原则持绝对信仰的王夫之,抑或怀抱热切进取之志的钱秉镫,都不得不带着失落最终退出政治参与。这些典型案例无不表明:明遗民们虽然有志匡济,这一途径却无法安顿他们的身心。

关键词 明遗民;南明;反清复明

中图分类号 K249.07 **文献标志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000-9753(2023)01-0000-00

救亡是明遗民面对的时代主题,他们的人生理想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。然而,看起来最直接的办法——复明运动——从政治上恢复汉民族的独立,却并没有能够成为救亡的主要途径。

从弘光帝南京继统,到永历帝被俘杀于缅甸,南明政权在起起伏伏中维持了十八年。若论弘光朝初建时形势,清人刚刚进入中原,统治尚未稳固;李自成政权虽然破产,军事实力仍在,尚为一大危险因素;除去新近归降的汉族军队,八旗总兵力不过十万^①。而弘光朝仅集结在江淮地区的兵额已逾二十万^②,且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在故明官将的管辖之下。如果南明君臣能上下一心,重振旗鼓的希望是很大的;即使不能恢复中原,至少也可如东晋、南宋一般留住半壁江山,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。在这种形势下,不少遗民寄望于抗清复明。

但是,弘光朝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政治、军事核心,能承担续绝存亡之任:这个被汉族士民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政权覆亡于短短的一年之间。此后,政治混乱在继起的几个南明朝廷中延续下来。无论是监国浙东的鲁王,还是登基闽中的

隆武帝,或者播迁于两广、云南、缅甸的永历帝,都未能掌握实权,其胆识、心胸与才能且不足以拨乱反治。追随南明政权,从事抗清活动的明遗民遭遇了各种尴尬,经历了各种痛苦的心灵挣扎。通过下面几例典型案例,本文试图考察他们在此期间的主要心理状态。

张岱:及时抽身者的权衡

张岱和南明鲁王政权有过短暂接触,但退出较早。《陶庵梦忆》云:“福王南渡,鲁王播迁至越,以先父相鲁先王,幸旧臣第。岱接驾……极君臣之欢。”^{〔1〕}由于父亲的关系,张岱大约是以鲁王故臣自居的,乙酉年(1645),他到台州鲁王军中效力,以“东海布衣”的身份上疏要求立斩马士英。疏中说:“臣中怀义愤,素尚侠烈,手握虎臣之椎,腰佩施全之剑。愿吾主上假臣一旅之师,先至清溪,立斩奸佞,生祭弘光。敢借天下第一之罪人,以点缀主上中兴第一之美政。”^{〔2〕}言辞的激烈正见出他此时急于报国的心情,鲁王为其打动,“疏入,监国召岱至

收稿日期 2023-01-15

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大学 2022 年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启动项目课题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 李瑶瑄(1985—),女,四川成都人,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讲师,文学博士。

御榻前,诏以‘先杀后闻’。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蹶之”^{〔图〕}。但马士英却又与方国安勾结挟制鲁王,张岱反而受到排挤:“士英宵遁江上,见其私人方国安,挟制鲁王,斥逐张岱。”^{〔图〕}

乙酉年九月,张岱归家隐居。方国安却又派人礼聘他出山。在其多次催促下,尚希望在国事中有所作为的张岱有些动摇了,他预备应征前往。据《陶庵梦忆》的记录,是途中的一个梦使他改变了计划,最终坚决地退出政局。其文曰:

摇摇乙酉秋九月,余见时事日非,辞鲁国主,隐居剡中。方磐石(方国安)遣礼币,聘余出山,商榷军务,檄县官上门敦促。余不得已,于丙戌正月十一日,道北山,逾汤园岭,宿平水韩店。余适疽发于背,痛楚呻吟,倚枕假寐。见青衣持一刺示余,曰:“祁彪佳拜!”余惊起,见世培(祁彪佳号世培)排闥入,白衣冠。余肃入,坐定。余梦中知其已死,曰:“世培尽忠报国,为吾辈生色。”世培微笑,遽言曰:“宗老此时不埋名屏迹,出山何为耶?”余曰:“余欲辅鲁监国耳。”因言其如此如此,已有成算。世培笑曰:“尔要做,谁许尔做?且强尔出,无他意,十日内有人勒尔助饷。”余曰:“方磐石诚心邀余共事,应不我欺。”世培曰:“尔自知之矣。天下事至此,已不可为矣。尔试观天象。”拉余起,下阶西南望,见大小星堕落如雨,崩裂有声。世培曰:“天数如此,奈何!奈何!宗老,尔速还山,随尔高手,到后来只好下我这着!”起,出门附耳曰:“完《石匱书》。”洒然竟去。余但闻犬声如豹,惊寤,汗浴背,门外犬吠嗥嗥,与梦中声接续。蹴儿子起,语之。次日抵家,阅十日,孺儿被缚去,果有逼勒助饷之事。忠魂之笃,而灵也如此。^{〔图〕}

是不是真要抽身而退,张岱非常犹豫。他已经预感到了事不可为,但为臣尽忠的伦理传统使其很难决断。四个月来,出、处问题大约一直在他的考虑中,退则有所不甘,进则希望渺茫,他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境地。

其实张岱对于现实是有清醒认识的:对于鲁王,他有感恩图报的心理,但却深知其弱点:“从来求贤若渴、纳谏如流,是帝王美德,若我鲁王,则反受此二者之病。……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,闻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。附疏满廷,终成孤寡,乘桴一去,

散若浮萍。无柁之舟,随风飘荡,无所终薄矣!鲁王之智,不若一舟师;可与共图大事哉!”^{〔图〕}他对鲁王并不能报多少希望,梦中祁彪佳之言“天下事至此,已不可为矣”,实际上早已隐藏在张岱心里。

他很清楚自己在政局中的位置。“余欲辅鲁监国耳”恐为一厢情愿,方国安的征聘别有用意:“强尔出,无他意,十日内有人勒尔助饷”,不是真想“商榷国事”,而是看中了他的家财。朝中重臣所图谋者不过如此,张岱纵有经世救亡之才也无济于事,他的抱负、才干,没有施展的可能。在此情形下,执着于政治参与便有遭受挫折、甚至送掉性命的危险。梦中祁彪佳的警示“随尔高手,到后来只好下我这着”,其实是他自己在情感的进退犹疑中,对形势所作判断的一个曲折反映。

张岱决定退出政治参与,与他自尊自重的人格取向也应当有关。他自小“遵大父教,不读朱《注》(《四书>)”^{〔图〕},向往“高洁韵同秋水,孤清操比寒梅”^{〔图〕}的人格境界,思想上独立意识很强。对于明代的君主,如神宗、崇祯帝,他有大胆的批评。其批评的依据是儒者之“道”——同一思路,在张岱的政治理想中,帝王之“势”是应当服从“道”的。因而,他期望以帝王的尊信为出仕的前提条件,不愿陷身泥淖。他后来在《石匱书后集》评论南明诸王云:“甲申北变之后,诸王迁播,但得居民拥戴,有一成一旅,便意得志满,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,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。东奔西走,暮楚朝秦,见一二文官,便奉为周、召;见一二武弁,便倚作郭、李。唐王粗知文墨,鲁王薄晓琴书,楚王但知痛哭,永历惟事奔逃,黄道周、瞿式耜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,谁知赵氏一块肉,入手即臭腐糜烂。如此庸碌,欲与图成,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。”^{〔图〕}他清楚地意识到南明诸王皆庸闇软弱,仕之而不但道义不得行,救亡中兴不可能,个人的尊严与生命亦难以保全。

更重要的原因,是张岱找到了别的途径来实现人生理想——完成明史《石匱书》的撰写。这部著作他在崇祯元年(1628)就已动笔,此时尚未完成,国变后,故国史书的修撰更具有文化保存的意义。较之无益地丧身不测,留下有用之身来完成这部史书更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。“皇明无史乘,五凤属谁修。九九藏《心史》,三三秘《禹畴》”^{〔图〕}。他把今后的人生,转向了寄托于这部明史的修撰。以此为价值基础,张岱从政治活动中抽身退出,转而能依

靠自我的力量来实现人生理想。

王夫之：进退两难者的煎熬

王夫之是衡阳人，源顺治五年（顺治五年）清军下湖南，他与管嗣裘起兵衡山相抗。战败，南赴粤中，永历朝授以行人司行人。

王夫之加入永历朝廷，正值其内部党争势同水火之时。户部尚书吴贞毓等十四人联名上书，源戚袁彭年、金堡等人为“五虎”。金堡等因被逮下狱，考掠甚苦。就此，王夫之三次上疏申救，并弹劾首辅王化澄结奸误国，却遭反噬，几致入狱。他愤激呕血，于是移疾桂林依瞿式耜。不久，清军下桂林，瞿式耜殉难，王夫之辗转回到湖南。

顺治九年（源）、十年（源），挟持永历帝入滇黔的孙可望两次以君命招王夫之前往。王夫之由此陷入了进退两难境地。在《章灵赋》及其自注中，他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想法。《序》云：“时孙可望挟主滇黔，有相邀赴之者。久陷异土，既以得主而死为歆。托比匪人，尤以遇巷非时为戒。仰承神告，善道斯章，因赋以见。”源他还期望着能够报主尽忠，但眼前的形势又让他踌躇。

“以得主而死为歆”和“以遇巷非时为戒”的思想斗争造成了他的踌躇。前者，恪守君臣之义，乃其立身支柱；后者，内外交困、不合时宜的担忧，让他难于前往。“遇巷”出自《周易》“睽”卦九二“遇主于巷”，形容挤进了小巷，难于转身的困境。

对于王夫之来说，君臣之义是其自觉坚持的道德律令，他说：“唯我为子故为孝，唯我为臣故尽忠。顾七尺躯，耳目在体而心函于内，忠臣孝子，非以是奉君父，而但践其身心之则。”源在他看来，作为臣子，尽忠乃其天职所在，此一原则毫无回旋的余地。他因此对以不仕二姓在明遗民中普遍得到推崇的陶渊明、司空图也十分不满：“陶潜、司空图之早遁，吾未能信之以诚也。”源二人在国未亡时即提前隐居，没有尽到臣子应尽的责任，其忠贞之心打了折扣，他强烈不满于他们的“萧然自适”，认为这是一种自足于个人的小天地而放弃社会关怀的态度。这种严苛表明，他坚信报君行道是儒家士人、尤其是已为人臣者必须承担的责任。

在《章灵赋》中，他追溯了自己离开永历朝的经过：“既三谏不听，谏道穷矣。乃以病乞身，遂离行

阙。而心念此去终无见吾君之日，离魂不续，自此始也。”源离开君主，他是无奈的，内心还充满了眷念，但永历朝的政治状况却令其疑虑重重：“时上受孙可望之迎，实为所挟，既拂君臣之大义；首辅山阴严公，以正色立廷，不行可望之王封，为可望贼杀。君见挟，相受害，此岂可托足者哉！”源君臣之义无法得到实现，贸然前往非但不能产生实效，反而很可能白白葬送自己。他进退失据，极为痛苦：“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士以藏身，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，进退萦回，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？”源

他珍惜自己，一定要选择一种能够实现价值追求的生存方式，在人生的岔路口上，能不能冒险一试？“为不善如崩，易斯速也。为善如登，难斯劳也。其始也一几之决，其终也相去邈绝矣。其几微之介，留汶难知，而转移歛倏。使以皓素至姿，聊且受染于淄黄，而中变其故，则终至暮年，不可复改。是则素抱清虚之志者，安能妄投于一试耶？”源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线，一旦选择错误，要想扭转崩颓之势千难万难，而人生很可能就此蹉跎衰朽了。素有高尚之志的王夫之，很难把自己托付给险恶莫测的时局，他不愿意轻率地尝试。

他想要留着有用之身以寻找别的价值实现之途：“（老）聃当无以尚冲兮，非废用而颓滑。康违堪以木形兮，激契阔于履、发。偃龙玄其贞庸兮，矧秉礼于鄢阙。”源这几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，老子以无用为有用，并不是要陷入颓废昏乱；嵇康非汤（履）、武（发），也只是其土木形骸的一种方式，二者实际都别有寄托。审如今之势，不妨效仿其避祸全身；“秉礼教于鄢里阙党者，其得弗择地善行，而徒取进趋乎？”源他想到：“进趋”之途既然不通，退而从鄢鲁（阙）之教，“以理人性，以正人纪”，把人生重心转移到为往圣继绝学，同样具有价值。

即使如此，王夫之仍然无法安心：“自念其名义既如此矣，而爱主之心，尤不能忘。”源在接下来的文字中，他一再表白：“俾得所托以西归，则随溘先晨露，固所愿也。”源又反反复复地诉说着朝局的无法作为：其心理无法自安，仍处于“梦驱驰而终畏罔决”源的焦虑状态之中。

他决定求助于神灵，请他们给予启示。两度卜筮，皆得《睽》之《归妹》，卦象正暗合了他内心的担忧：“豕负难测之秽，鬼增妖怪之情，则以睽孤之道处此，而欲保其清贞，固难堪矣。”源朝中奸恶

当道,正气不昌,往必辱身。

他又以《庄子》的“缘督”思想来劝解自己,“善不近名,恶不近刑,不凝滞于物而与物推移,所谓缘督者也”^{〔源〕}。不要在具体的途径上固执:“天理幽隐,初无定在,迁移于无迹之中,则昔之所可,今或否矣,其得立一必美无恶之事,以耽著而沈溺之哉?”是非善恶与时迁移,必美无恶之事并不存在,行事不可拘泥定见。《庄子》“缘督”之论是为了打破人们对善恶的执著,王夫之却用来化解自己不能追随永历帝的痛苦。他的选择其实已足够正当,之所以要把这个思想资源也一并用上,正是由于对君臣之义的执著煎熬着他,使他无法放过自己,而变相地表现为寻找一切可以自我支持的理由。

他没有应召前往,但终究无法安心,在赋的最后,只好祈望永历帝能够明白自己的心迹于幽渺之中:“幽兆千里,翼余忱兮。”^{〔源〕}自注云:“唯幽冥之中,若有朕兆,可翼余忱以必达。”^{〔源〕}以王夫之的理性与务实,当然无法真正相信幽冥之事,这不过是他自我安慰最无奈的一种表达。

此为王夫之作出去留决定的整个过程。我们可以看到,在当时的情况下,孙可望以“流寇”(孙可望原是张献忠部下)挟持永历帝使用南明旗号,作为一个持儒家正统观念的士大夫,王夫之的选择不能不说是明智的。可是严守君臣之义的自我要求,又使他终身不能摆脱强烈的痛苦。康熙元年(1662),在得知了永历帝的死讯后,他有一首《长相思》:“长相思,永离别,地坼天乖清泪竭。油卜罢春灯,寒碓谢秋节。宝带裂同心,他生就君结。”^{〔源〕}真是缠绵哀怨到了极致。三十年后临终绝笔之时,他还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“孤臣”^③。

王夫之晚年作联于室曰: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。”^{〔源〕}写他内心世界的最终着落,和此种着落所带来的痛苦。为了解脱现实政治活动带来的失落,他把人生价值寄托于思想理论的探讨,寄托于文化之保存与延续,但是作为一个忠君思想深入骨髓的儒家士人,危难之际弃君而去,他又深感生的价值的失落,“七尺从天乞活埋”,深藏着他后半生的无边的痛苦,意谓生不如死。

钱秉镫:锲而不舍者的无奈

钱秉镫,国亡前为复社名士,好谈经世之略。清

军下江南,与钱榘共举义师于震泽。师溃逃亡,其家眷正好与清军迎面相逢,为避免受辱,他的妻子领着一儿一女跳水自沉。钱秉镫携仅存之子去福建投奔新建立的隆武朝廷。一年之后,隆武帝亦亡,他又从福建奔广东追随永历帝。清军南下,永历帝被孙可望挟持到了贵州,他在混乱中走散,才回到故里。

从乙酉(1645,顺治二年)到辛卯(1651,顺治八年),钱秉镫亲身经历了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历三个朝廷的兴衰。为了追随明统,他在战火中辗转跋涉于苏、浙、闽、赣、粤、桂、湘之间,其政治生涯中表现出之坚韧远远超过一般的遗民。

有两个原因带给他这样的坚韧。一是家破人亡的遭遇。这让他失去了牵挂,从此一心托付于复国之事,国恨家仇的夹杂又使其反清之志更加坚决。二是他用世经世的热情远过常人。追寻钱秉镫这些年的心迹,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一点。

妻儿惨死以后,钱秉镫用“吞声是国恨,原不悔倾家”^{〔源〕}来自我振作,踏上前往福建之途。可是崎岖两月,终于到达隆武行在时,友人“踉跄导我谒贵人,贵人高卧朝不起;出门赠我一缗钱,媿彼黔娄反袂死!”^{〔源〕}对比天高的钱秉镫来说,这真是莫大的讽刺,他顿时感到受了侮辱,满腔热诚化为悲愤:“我不学入关上书市井儿。古来圣贤几得志,我死子宾铭我碑!铭曰‘龙眠生徒湖海士,有才无命如赵岐’。”^{〔源〕}他原是以“大才”、“圣贤”自命的人,书生意气,现在才真正尝到苦涩。

但他并没有一怒而去,而是经过等待,由黄道周的推荐,授了一个延平推官。他在此期间的诗歌写作,许多直接针对着朝政中的弊病:《侯家行乐词》讥讽郑氏家族骄宠奢靡,《石牛驿》、《沙边老人行》叙写战乱、赋役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;《萃士歌》云朝中大臣无实干之才,在国难当头之时仍一味吟风颂雅。其锋芒也直接指向隆武帝本人,《故人行》写他宠幸私恩,滥用赏赐^④;《越东破》讽其在与鲁王的国统之争中为私心所牵,不能顾全大局,未谙唇亡齿寒之理^⑤。在《拟上行在书》中,甚至发言不逊:“以臣观之,陛下所法者,皆光武底定中原、即位以后之事;而所由艰难辛苦以成功者,臣尚未之见也。”^{〔源〕}

南明君主威权不重,不少士人不再把君主看得神圣凛然、不可侵犯,钱秉镫本人虽然还有报国尽忠的传统心理,却不像王夫之那样认为臣对君应当绝对地顺从与忠诚^⑥。

他对朝政,实际上是有诸多不满与批评的,对于自己的境遇,更有许多愤懑,以至自嘲为“嘯傲半生成小草”^{〔苑〕},甚至明白表示过“时事竟难论,秋来悔此行”^{〔苑〕}的“悔意”。但他依然委屈留下,主要是由于他的进取意识仍然很强烈。即使作为一个不能进入朝政中心的延平推官,他也写了《拟上行在书》,纵论国事,从皇帝本人的立身赏罚之道,到与鲁王的关系处理,甚至今后的战略部署,无不切切而谈。虽然只是一纸无法上达的文书,却体现出他期望复国报仇情绪的迫切。他把个人建功立业、自我成就的追求,也寄托在这上面,其诗云:“端坐不得志,出门横朱轮,辉光盈道路,车上意气新。孙弘起牧豕,买臣方负薪;一言当天子,遂据要路津。叱咤奔风雷,顾盼生阳春。如何贾谊才,终老长沙滨;丈夫有时命,岂必终苦辛!”^{〔苑〕}他仍然相信,通过执着追求,只要时运相济,就有可能改变穷愁乖蹇的现状,有日叱咤风云,终能致富贵显达。

隆武帝汀洲遇难后,永历帝即位肇庆,顺治五年(员)正月,金声桓江西反正,中原震动,四方响应,复明运动出现了转机。留滞闽中的钱秉镫立即振奋出闽,辗转到端州觐见永历帝。

他以“去珠还入掌,断雁再随行”^{〔苑〕}来形容自己抵达永历行在的喜悦,并上疏云:“臣新从虏地来,见闻可据”,因备言江西战况,分析天下大势,断言“今日中兴之大势,实在江西”。疏末云:“臣本咕咩小生,不知戎事;但观古人用兵之机宜与今日进取之大势,如臣所见,似不为谬。乞下臣此疏与廷臣共议之!并赐面对,俾得口陈委曲、指画形胜,使了然于陛下目中;亦不负微臣万死趋朝之寸忱也!臣不胜激切之至。”^{〔苑〕}确实只有“激切”可以形容他的状态。不顾自己是否有议论这样关键的军政要事的资格,不管能否取得旁人的认可和信赖,仅凭着“万死趋朝之寸忱”就敢于要求“与廷臣共议之”,“赐面对,俾得口陈委曲、指画形胜”,钱秉镫要一展怀抱的愿望,是如此急切。

尽管永历朝廷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,还是授给他礼部主事之职,次年又在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中取中第二名,特授庶吉士,兼诰敕撰文,钱秉镫的从政生涯达到了高峰。

全祖望批评钱秉镫说:“盖热中于进取耳。嗟乎!是何天子、是何节度使,尚求进不已乎?”^{〔愿〕}如果抛开全祖望语意中隐含的讽刺意味,说钱

秉镫“热中进取”,倒也不假。

他的确有追求个人仕进荣显的想法。在参加永历朝制科考试时,其“热中”表现得非常明显。他有《临轩曲》二十首专咏此事,详细记录了考试的整个过程,津津于能显现恩荣的许多细节。《纪梦》一诗,更透露了他的热切:

摇摇万里松楸逼岁情,频宵入梦迴心惊。谢恩亲办春曹服,(临轩前数日,先君取礼部服色谢恩。)入彀兄觐仙榜名。(又梦亡兄伯至告曰:予见榜矣,汝在第二。)胪唱果输元辅荐,(刘出元辅黄门下。)宫衣不赐庶常荣。(庶常故无品服。)鬼神预报非无故,应识天庭拱圣明。^{〔苑〕}

由于对这场遴选寄予了很大期望,精神的紧张使他在考试还未进行之前,就梦到亡父准备好官服谢恩,后来又梦到亡兄前来通报高中。诗中对名次、品服的关心体现出,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,钱秉镫仍未脱离明代士人习惯的以金榜题名、仕途显达为目标的自我成就之途。

但如果将此仅仅理解为个人私心之追求,也不无偏颇。在钱秉镫那里,它和尽忠报国的思想结合在一起,成为建立功业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理想。同僚龚在田因上书失意,有归志,他劝说以“幸逢正统宁宜去,且辍忧时痛哭章!”^{〔苑〕}又安慰因金堡案而对朝政产生疑虑的侯商丘云:“侯生饮酒君勿疑,君之劳绩天子知;即今军功期报主,报主孰有如君奇!”^{〔苑〕}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所想,一旦有效力之机,他的进取心就昂扬起来。他数次上书议论朝政,分析孙可望和李定国出滇作战的可能性,讨论怎样应对他们封爵的要求;即使在永历朝受到排挤,也并不灰心失意,还说:“倘微开史局,予岂望投闲”^{〔苑〕};他自己尚不知何去何从,却力劝方以智出山辅政:“兴朝大政需公出,早办收京并马归”,“主恩十召君应起,莫恋沧江负白麻”^{〔苑〕}。他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,这些年留下的诗作,明显集中于评议时政,记录政局变化。

金声桓、李成栋反清归明之后,江西、两广复归南明版图,湖广、安徽的许多地方也迅速响应,一时间复明运动风起云涌,声势十分可观。不少遗民的复国热情被激发昂扬起来,钱澄之正是其中一员。但是,拥兵军阀各怀私心,互不相容,永历朝廷缺乏威权,不能有效地进行军政部署。一年之后,金声桓、李成栋相继兵败身死,永历朝复陷于风雨飘摇之

中,中兴希望破灭。到 1646 年,在清军的追逼下永历帝不遑宁处,只好投靠张献忠旧部孙可望,避难于云南。永历朝的朝臣们都明白大势已去;一些有心追随者,也很难跟上永历帝的盲目奔逃,在兵荒马乱之中只能裹足不前。

钱秉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^⑦,辗转回乡。他本是把个人的价值追求寄托在建立功业上的一类士人;易代的动乱摧毁了他的家庭,使其将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于政治活动,成就了他的执着。然而即使如此,他也无法在南明的任何一个朝廷中有什么作为。几个南明朝廷对明统的延续给遗民们保留着最后的希望,但事实上,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以

外,掌握实权的军阀大都主要关注眼前利益的争夺,很少真正以复国为出发点。明王朝在它腐朽衰败的过程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凝聚力,无法重振人们的信心;大多数人的家国理想都敌不过现实利害的考虑,很难有人相信这个王朝能重新崛起并带给他们保障。想要在如此散沙般的政权中有所作为免不了要不断承受失落,执着如钱秉镫,也终究只有“炉灰死尽志初降,夜半披衣礼法幢”^⑧〔苑〕,南明政治生涯只给他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:“戢影江潭之上,混迹僧俗之间;回首同游,有如噩梦!”^⑨〔苑〕他心灰意冷至极,此后数年皆未能摆脱失志困顿的境遇。

注释:

- ①雍正“上谕”说:“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,兵亦不过十万。夫以十万之众,而服十五省之天下,岂人力所能强哉!……其时统领士卒者,即明之将弁;披坚执锐者,即明之甲兵也。”(《大义觉迷录》卷 1,《清史资料》第 9 辑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 年,页 104)
- ②《弘光实录抄》卷 9:“定兵额:京营 1 万,神武营 5 千,四镇每镇 3 万。安庆陆兵 1 万,水兵 5 千。应抚 3 千,总兵 5 千。淮抚 1 万 5 千。凤督 1 万。京口 1 万 8 千。芜采水营 1 万。”(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10 册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3 年,页 156)
- ③《绝笔诗》云:“荒郊三径绝,亡国一臣孤。霜雪留双鬓,飘零忆五湖。差足酬清夜,人间一字无。”(《船山诗文拾遗》,《船山全书》第 1 册,页 120)
- ④《故人行》云:“汉家天子重故人,南阳耆旧衣冠新;羊裘已随安车至,钓滩寂寞谁垂纶!溲沲麦饭茱萸粥,黄金大郡报不足。共称天子笃恩私,努力云台慰主知;请君试看冯异赐,不是溲沲纆过时!”(《藏山阁诗存》卷 1,页 15)
- ⑤诗云:“当天天子高皇孙,鲁国同是至亲藩;改元本非利天下,域内原宜奉一尊。越东君臣殊可笑,誓死不开登极诏;天子洒笔亲致书,相期先谒高皇庙!闽中恃越为藩篱,如今越破闽亦危;往时纷争不足论,与国既失应同悲!昨夜室中诞元子,通侯鹤印何累累!中兴所重在边疆,恩泽滥冒同烂羊。唇亡齿寒古所忌,君不闻元子之诞辰先亡?”(《藏山阁诗存》卷 9,页 120)
- ⑥他在康熙年间转变了对待清廷的态度。详见拙文《清初五十年间明遗民群体之嬗变》,(台湾)《汉学研究》第 10 卷第 1 期。
- ⑦钱秉镫时在桂林,赶回梧州时,永历帝已不知去向。《到梧州界,闻乱道梗》云:“咫尺梧州路,孤臣去住愁;烽烟迷日暮,旗帜塞江流。扈从纷相失,乘舆何处求?惊闻鲁司马,无故自焚舟!”(《藏山阁诗存》卷 1,页 120)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岱撰,陶庵梦忆[跋]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 年。
- [2] 张岱撰,石匮书后集[跋]。台湾:台湾文献丛刊,第 100 种。台北:大通书局,1982 年。
- [3] 张岱撰,张岱诗文集[跋]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 年。
- [4] 王夫之撰,姜斋诗文集[跋]。《船山全书》第 1 册。长沙:岳麓书社,1982 年。
- [5] 王夫之撰,通鉴论[跋]。《船山全书》第 4 册。长沙:岳麓书社,1982 年。
- [6] 王夫之撰,广传[跋]。《船山全书》第 1 册。长沙:岳麓书社,1982 年。
- [7] 钱秉镫撰,藏山阁集[跋]。《藏山阁集》第 1 册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 年。
- [8] 全祖望撰,全祖望集汇校集注[跋]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 年。

[责任编辑:李大明]